

1949,陇东革命老区干部支援“新区”

□ 董勇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迅速取得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西北野战军也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整个甘肃大地。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败,甘肃各地国民政府组成人员纷纷作鸟兽散,地方政权出现空白。组建新的政权机构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干部紧缺,致使甘肃新区出现“干部荒”。

为了迎接甘肃新生政权的诞生,迅速输送大批干部接管新区,陇东分区早在两年前已经开始积极筹备。1947年初至1948年2月,陇东分区有136名干部随军,168名直接参军,381名调往新区开展工作。1948年3月,中共陇东地委和分区专署决定,将陇东中学改建为陇东分区党校,分设党政干部训练班和新区干部培训班,开设政治、文化、军事训练课,主要为区、乡、村培养政治、军事、党务、经济、文教等项工作的干部,为接管新区做准备。1948年4月曾连续两次抽调322名干部随军和在新区任职。7月后,根据西北局的指示,陇东分区党组织把为新解放区输送干部作为政治任务,大力开展培养选拔干部工作。

至1949年3月,仅华池一县就选拔干部118名,送党校学习和培养的干部225名。5月,陇东分区党校更名为分区干部学校,增设班次,扩大招生,增加学习内容,增设课程,为收复和接管工作培训各类干部。至7月,共培训干部889名,其中

460名干部到新解放区参加了接管和政权建设工作。这期间,陇东各县也开办短训班,以时事、土改政策、肃反政策、收复区政策等训练内容,加快干部培训步伐。华池、环县、镇原、庆阳、曲子、合水、新宁、正宁8县,共举办干部培训班40多期,培训干部1140多人。分区和各县的统战、民政、经济、妇女、青年团等系统也分别举办各种培训班,培养了一批专业干部,向新解放区输送干部1300多名。

1949年8月,陇东军分区选调干部战士400名,到平凉、天水、会宁参加组建地方武装和军分区机关。陇东分区干部学校学员随解放军向西挺进,一部分学员留在平凉分配工作,抵达定西时,中共甘肃省委刚成立,学员移交给省委分配工作。如庆阳县县长杨福祥被派往泾川县任县委书记,庆阳县统战部长贾庆礼被派往隆德县任县委书记,三十里铺区长武占斌随军到海原县任县委书记,陇东专署秘书长杨生随军西进,任酒泉专署民政科长、安西县委书记,甘肃工委副秘书长陆为公任定西专署副专员,李正廷任武都军分区副政委,王耀华任岷县地委书记,杨和亭任临夏地委书记,贺建山任酒泉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等。

在甘肃省、地、县的许多新生政权中,几乎都有陇东解放区去的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

任庆阳县第二任县委书记的魏俊杰回忆说:他在1950年初接任县委书记时,庆阳县的干部基本走空了,连县委书记赵云山和县长蔡德旺都调往了省城。不要说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就是区、乡级的干部,也走得只剩了驿马区的一位乡长。因这位同志的年龄实在太大了,走不出去才留在了当地,其他区、乡的领导干部都走了。当时的任务之一,就是选派干部去新解放区任职。为了支援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光从庆阳县走出的干部就不下千名。

陇东解放区的干部培训取得显著成效,给新解放区的接管和新政权的建立输送了大批干部,保证了新解放区各类干部的需要,促进了新解放区接管、建政工作的顺利完成,为甘肃乃至西北新生政权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1949年底,全省干部总数31547人,占总人口968.45万人的0.33%。随着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干部需求量增大,主要从军队转业干部、大中专毕业生中吸收,从工人、农民和社会上招录。甘肃全境解放后,各级党组织在迅速完成对国民党政权接管改造的同时,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训练和吸收大批积极分子参加革命工作,以适应各条战线急需干部的需要,为党所领导的政权建设、恢复国民经济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南梁地区的群众工作

1933年11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一带进行军事斗争、开展游击活动、创建第二路游击区的同时,派出得力干部配合地方开展发动和组织群众工作。梁沟会议后,成立了由吴岱峰任主任的南梁后方工作委员会,任命张策为红四十二师后方特派员,领导和开展南梁根据地的群众工作。

1933年11月,习仲勋来到南梁,先在莲花寺附近的豹子川贫农李老五家中养病。习仲勋在李老五的精心照顾下,很快恢复了健康。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住在豹子川李老五家里,因这一带敌人活动,李老五白天把我送到山里,晚上接我回来吃饭。”

习仲勋养病期间,就开始了南梁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据后来任南梁政府保卫大队中队长的王殿斌回忆:“1933年11月,刘志丹来南梁,在羊子庄开会、宣传,留下习仲勋、张策、吴岱峰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农会、工会。首先在小河沟、豹子川开展,白家洼子村会张社宗负责、羊子庄村会王建保负责,老庄河村会邵凤山负责,焦台沟村会张子修负责,白岭村会田月喜负责。”

春节前夕,习仲勋从南梁豹子川赶到十多里外的二将川。这时,刘志丹领导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主力正在南梁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新的苏区。红军主力离开南梁后,习仲勋带领庆阳游击队和一部分地方干部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工会。群众工作首先在小河沟、豹子川展开。

由于南梁堡人民群众深受庆阳大地主“裕茂隆”“恒义和”和当地大地主赵福奎等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十分困难,革命的愿望十分强烈。习仲勋、张策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召开群众会议,发动贫苦农民群众,很快南梁一带成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习仲勋回忆道:“当我们确立了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即以南梁堡、华池县为中心建立基础,再向南北发展,主力二十六军依据这个中心地区,南北策应,把一、二、三路根据地打成一片,创造大块的陕甘苏区。据此任务,我们的方针是准备与成立武装,开展游击运动。首先扫清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赵老五及二将川这些地方的地主武装。又因这一带的群众很落后,高岗与我们就挨家挨户的进行宣传工作。并在该地缺乏牛羊的情形下,发动他们配合游击队分牛羊,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

习仲勋和张策经过调查研究,确定了群众工作的步骤和方针,即:先开展耐心细致的群众宣传解释和动员工作,建立群众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红二十六军带领游击队扫清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他们深入到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小河沟等地的贫苦农民中,访贫问苦,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组织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并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和休养。帮助各村组建游击队、赤卫军,武装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开始,南梁一带的贫苦农民也并不完全了解红军和共产党的政策,红军到后,有些群众吓跑了。为了以实际行动影响教育群众,红军吃群众的饭后,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并留下纸条,上面写着: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解放你们,你们不要怕等等;走时还将住过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群众慢慢就不怕红军了,对红军的印象很好。经过教育发动,群众逐渐觉悟起来。习仲勋等革命干部积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起雇农工会、贫农团、农民联合会和游击队、赤卫军。

在习仲勋、张策等领导下,南梁地区成立雇农工会12个,每个工会选举主席或会长1名。1933年冬,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会在金盆沟成立,白阳珍任主任,贺二任副主任。11月25日,在南梁小河沟的四合台村建立了南梁地区第一个乡级苏维埃政权。接着,组织建立二将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南梁堡、豹子川、义正川、五堡川、白马川等地的农民组织,成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群众团体,把农民、手工业者、妇女组织起来。这些群众组织非常活跃,对根据地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和土地革命均起到很大作用。

当时,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只吸收雇农(长工、无地的农民)、贫农参加。农民联合会由贫农和中农参加,雇农也可以参加。农民联合会是以贫困农民为主要力量的组织,属于临时基层红色政权性质的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通过选举产生,主要任务是组织农民、发动农民,领导农民打土豪、分财产,开展土地革命斗争,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

1933年冬至1934年春,在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等地相继建立赤卫军大队5个,约1000余人。荔园堡、小河沟、豹子川一带为第一大队,大队长郑德明(后陈贵存),辖3个中队;玉皇庙、马莲岔一带为第二大队,大队长高生荣,辖3个中队;白马庙川一带为第三大队,大队长张步云(后朱志清);二将川一带为第四大队,大队长梅生贵(后阎树堂、王俊山);葫芦河一带为第五大队。赤卫军是农民的军事组织,维持地方治安,协同农民联合会开展工作,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主要用梭镖、大刀、猎枪和少量步枪武装自己,承担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豪恶霸、转移伤病员、保护群众,积极配合红军和地方游击队作战,保卫和发展壮大南梁革命根据地。1934年秋季,南梁地区的赤卫军发展到18个大队。(文章节选自《南梁革命根据地史》)

丝路览胜

周祖故里碾子坡

□ 梁长生

陕西省长武县碾子坡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具体点讲,长武碾子坡是周祖故里。

胡谦盈说:“从考古成果来看,目前为止,碾子坡是一个最重要的先周文化遗址,年代最早是它,现存遗址中内涵最丰富的也是它,周人最早的聚居地就是碾子坡。”胡谦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她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队、安阳队、丰镐队和泾渭队队长。她领导和主持晋南、豫东和泾渭三个地区的考古调查,以及丰镐都址、安阳殷墟、陕西省碾子坡等重要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研究。

碾子坡在今天的陕西省长武县冉店镇。1980年至1986年,由胡谦盈领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队在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群进行考古发掘,开创了我国先周史研究的一个新纪元。2014年,碾子坡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认定碾子坡是和丰镐、周原、殷墟同样重要的夏商周古迹。

据泾渭考古队研究发现,目前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泾河、渭河流域。已知的文化分布范围大致为:北界达到甘肃庆阳地区;南界在秦岭山脉北侧;西界在六盘山和陇山东侧;东界的北端在子午岭西侧,南端以泾河和石川河之间为界。全区南北长300多公里,东西宽200多公里,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天陕西省咸阳、宝鸡地区以及甘肃省庆阳、平凉地区的东半部。

据史书记载,周人由邠地迁至彬地的路线为:周祖不窋带领族人从今天的宝鸡一带沿关山先抵达泾河流域的崇信,再由崇信沿汭河止泾川,辗转之庆城扎根,教民稼穡,逐渐扩大其势力范围。因处于戎狄之间的庆城经常受到戎狄侵犯,为避免战事不啻之子鞠陶、其孙公刘在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逐渐南移,并设北豳国与南豳国。北豳国包括今天的陇东大部分地区,南豳国包含了今天的长武、彬县、灵台、麟游、旬邑及淳化的部分地区。

碾子坡是周祖故里,源于它有三个独立性发现。初次出土了先周时期的农作物遗留“碳化高粱”。据考古资料记载:“碾子坡高出住屋基址和灰坑的壁龛里以及已残破的陶尊内发现一些碳化粮食”,经鉴定,这些碳化粮食为距今3000多年前没有去皮的碳化高粱,这一发现把中国种植高粱的历史向前推了上千年。

出土了周人迁岐以前铸造属于铜制礼器中的“重器”——大型铜鼎。出土的两尊铜鼎,其中一尊乳纹鼎重约10.3公斤,是迄今发现年代较早的青铜重器之一。出土的一件铜甗上的鸟龙纹首尾衔接,以云纹为地,纹饰清晰,造型精美。

碾子坡三件铜器出土于先周墓葬。虽然没有铭文,但它是最早的实物,是跟司母戊鼎有着同样的价值的国宝。

出土了迄今为止数量众多、已知年代最早的先周文字甲骨文。胡谦盈说:“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今天的陕西省长武县、旬邑县和彬县一带,在中国古代称南豳地区。相传周人早期居住地及其都邑——周先王‘公刘居豳’的地望就在那一带”。

《史记》中周人族系第二人,不窋生活在戎狄群体之中,一方面指出,不窋时代“去履不务”,另一方面又强调,周道之行的原因是不窋的孙子—公刘时代实行“务耕种、行地宜”的结果。

先看看周人世系序列:后稷(姬弃)—不窋—鞠陶—公刘(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逾—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前1045—前1043)。

胡谦盈指出,“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陶器群迄今不见于岐邑和丰邑等地,说明它的年代略早于古公亶父时期”。

据考证,碾子坡周遗址群生活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相当于略早于古公亶父时期的殷墟武丁时代。从周世系表来看,每位统治者在位时间最长也就是20年时间,按照平均每位统治者在位15年时间计算,周武王姬发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46—公元前1043,从周武王到其先祖公刘时期中间有11位统治者。历经165年,这样推算,公刘时期也就相当于公元前1211年。这与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的时代正好相符。

可以想象,3000多年前在公刘统领下的碾子坡,男人们顶着烈日在田间辛勤耕作,女人们采桑织麻后看着日头天色为一家人准备饭食。田间、坡头、农具、土地、植物、牲畜、家禽,这一切书写出先民农耕时代丰富多彩的美丽画卷。



珍赏

趣味年画连环画

□ 钱国宏



年画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年画连环画则是指人民群众在过年时,贴在大门、灶台、屋墙上的一种以连环画形式展现的年画。它与连环画一样具有一定的连续的故事情节,有三四幅以上的画面组合而成。清代天津杨柳青的一组套色木刻《白蛇传》(单张分格)是我国一张较早的年画连环画。清朝末期,随着石印技术的西技东进,年画连环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单张分格开始扩展到双条屏、四条屏分格。民国初期天津版的《天河配》《二度梅》等(均为八条屏、24幅图)是目前国内发现分格最多的年画连环画。

早期的年画连环画多是条屏式的,常见的有四条屏的,由12—16幅关联的图画连载一起;有八条屏的,由18—32幅图画连在一起;也有整张条屏的,但其中又分若干幅小图。民间年画连环画色彩明快,浓墨重彩,彰显出一种节日的喜庆、吉祥氛围,内容多为民间故事、戏曲故事等,如元代剧作家王实甫

的《西厢记》,就是典型的民间年画连环画,全幅年画以红色为主调,饰以绿、蓝,突出了喜庆的节日主题。

建国后,年画连环画印刷技术得到了提高,题材更加丰富、广泛。国内一大批大师级画家纷纷转向年画连环画创作,如上海的程十发、刘旦宅、贺友直、戴敦邦,北方的王叔晖、刘继卣、任率英等。程十发创作的《列宁和炉匠》、刘继卣创作的《平常的会见》、贺友直创作折《婚姻法成全了两对好夫妻》等,都是因画面精良、画技精湛、存世较少而成为年画连环画中的“骄子”。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古典戏曲故事被改编成年画连环画,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崇和喜爱,炕墙上贴几幅年画连环画,成为许多农村地区过年时的一种时尚和过节内容。

年画本就是中国民间艺术中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形式之一,它与连环画的有机结合,不仅提高了年画的艺术表现力,也使群众增添了一种喜闻乐见的连环画艺术形式,其独特的内涵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喜爱。



民乐县政协《民乐华章》出版

由民乐县政协编辑的第二十辑文史资料《民乐华章》,日前正式付梓出版。

全书收录了全国各地作家、诗人对民乐历史文化、自然风光、人情风俗、特色产品的记忆、怀念、歌颂和述怀的149件文学艺术作品,分“史话民乐”“多彩民乐”“魅力民乐”“印象民乐”“诗话民乐”5部分组成,力求多角度透视民乐的文化旅游资源、城乡建设巨变和创新进取精神,约33万字。

全书以述、传、图诸形式,揽百年于一瞬,记历史之更替;熔百业为一炉,叙事物之兴衰,展现了一幅民乐风物人情的画卷。该书的出版将成为外界了解民乐悠久历史,感悟民乐厚重文化,感受民乐壮美风光,感知民乐风土人情的窗口,激励全县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再续华章。

(章新俊)